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断代简史类

晚清小说简史(上)

欧阳健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一辑

晚清小说简史(上)

欧阳健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沈阳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一辑

晚清小说简史(下)

欧阳健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小说简史(上、下)/欧阳健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2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1辑,断代简史类)

ISBN 7-5382-1705-3

I. 晚… II. 欧… III. 小说史-中国-清后期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608 号

2235/08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158 千字 印张: 9¼

印数: 22,689—25,688 册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顺德
装帧设计: 安今生

责任校对: 马 慧

定价: 9.00 元 (共二册)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会
重点规划项目**

本书获一九九三年中国图书奖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新资料、新观点撰写的晚清小说史。作者为了编著《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历经三易寒暑，走遍全国的主要图书馆，发现了大量的前人未知其名或知而未见的晚清小说。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这部晚清小说史的新作，自与前此的小说史有所不同。它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之后，不仅重新评价了前人论述过的名著，更对新发掘的小说作了评介。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林 辰 章培恒

主 编 侯忠义 安平秋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王 申 王海明

安平秋 张 俊 沈国经

欧阳健 骆桂明 侯忠义

曹亦冰 萧相恺 董哲潜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

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阅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一	晚清小说的繁荣及其原因·····	(1)
二	晚清新小说的发轫阶段 (1902—1903) ·····	(18)
	(一) 《新中国未来记》——晚清新小说 的开山之作 ·····	(18)
	(二) 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改革 小说 ·····	(36)
	(三) 晚清新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 ···	(59)
三	晚清新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上) (1903—1905) ·····	(80)
	(一) 《官场现形记》——改革背景下对 官僚体制的谛察 ·····	(80)
	(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的 改革眼光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 扫描 ·····	(114)
四	晚清新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下) (1903—1905) ·····	(135)

(一)	《文明小史》——西方文明的引进 和反弹·····	(135)
(二)	《老残游记》——爱国志士对于改革 维新的深层思考·····	(156)
(三)	《孽海花》——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 开眼世界的三十年心路纪程 ·····	(179)
(四)	《痴人说梦记》——以正面理想人物 为中心的长篇小说·····	(198)
(五)	《市声》——民族资产阶级初登历史 舞台的心声·····	(215)
五	晚清新小说的第二个高峰(1906—1909)	
(一)	立宪小说——改革的深化及其面临 危机的纪录·····	(233)
(二)	近事小说——革命清议的《春秋》和 《纲鉴》·····	(253)
六	晚清新小说的余波(1910—1911)·····	(275)

一 晚清小说的 繁荣及其原因

著名的文学史家阿英指出：“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晚清小说史》）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在明清两代（1368—1911）的五百四十三年中，一共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一千一百四十六部，而其中1901—1911年的十一年中，就产生了五百二十九部；短短十一年的创作总量，竟占了五百四十多年的46%！明白了上面的数字，一定可以对晚清小说创作的空前盛况，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引起了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们的意见，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尤其是石印和铅印技术的引进，没有从前刻书的困难，加上报刊

广载小说，促成了小说创作的发展。

第二，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作家们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创作热情空前高涨。

第三，是由于清朝政府屡挫于外敌，政治上又极腐败，大家知道政府不足与图治，便以小说创作来加以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对晚清小说繁荣原因的探究，直接关系到晚清小说的实质和价值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真正科学研究的起点，因而需要作更深入的剖析。

以上面所举的第一个原因来说，印刷术的发达，是出版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并不能构成晚清小说繁荣的直接原因。比如，石印术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印刷技术，它的采用，使我国的印刷业有了迅猛的发展。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之有石印术，始于光绪二年（1876）。其后则有英人美查在上海设点石斋印刷《康熙字典》，共印十万部；广东人徐鸿复等，于光绪七年（1881）先后开设同文书局及拜石山房，专事翻印《二十四史》等古书。按说更易获利的小说也应大量刊印，然而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75—1899）间，共出版小说七十九部，平均每年仅为三部。可见印刷术的发达，与小说创作的繁荣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说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果从1840年西方资

本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的鸦片战争算起,到1899年,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六十年的岁月。随着西学的输入,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开始发生变化,在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变革,但在小说创作领域内,却闻不到一点西化文化影响的气息。六十年中,不仅小说创作的数量极少,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三年(1840—1874)的三十五年中,只创作出版了五十四部,而且在这一为史学家划定的“近代史”范围内创作出来的小说,依然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和古代的小说,都没有质的不同,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由此可见,小说创作的发展变化,自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它并不必定与历史发展变化完全重合和同步。

晚清小说为什么到了1900年以后,才骤然繁荣起来呢?文学史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年发生的“庚子国变”。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亦屡挫于外敌,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气,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

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把庚子年作为晚清小说创作“特盛”的转折点，是很有见地的。只是他对于庚子前后的社会思潮的变化的概括，以及“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而导致小说创作繁荣的分析，却并不十分准确。

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中国屡挫于外敌，其中最突出的有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之败，1857 至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败，1884 至 1885 年的中法战争之败，1894 至 1895 年中日战争之败，等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清朝政府签定了又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领海等主权，使中国人民陷于黑暗的深渊。1900 年的庚子国变，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抢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换上便服，仓惶逃至西安，这确是一场浩劫，但比起以往的劫难来，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表现形态看，它不过是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奔热河的悲剧的重演，而从所引起的社会心理和思潮的变动来看，它也不及 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的震动来得强烈。所以，庚子国变的直接结果，并不是熄灭了“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美好境界的改革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

革的时期的来临。

庚子国变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正如梁启超所说：“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輿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这场灾难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机感，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者，经历了播迁逃亡、豆粥难求的痛苦以后，以巨额代价，增一层见识：“时经大创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决以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清史纪事本末》）这里指的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以光绪名义发布的谕旨，其中说道：“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这道谕旨，对“祖宗成法”进行了批评，提出“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的方针，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败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

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谕旨的颁布，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其后，清政府在教育、军事、行政、财政、法律等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说：“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慈禧太后的改革，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也反映了时代之变，潮流之变，清政府施政方针不得不变的历史大趋势，“振刷精神，力祛积弊”，“实事求是，共济时艰”，已经成为当时谕旨和奏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

同戊戌变法遭到顽固派强烈的嫉视和反对不同，对于这次改革，只有少数人私下表示不赞成。如有一位庚子事变中一直留在北京的仲芳氏，在辛丑（1901）五年初十的日记中，提到连日由“行在”发来的上谕，认为这是“乱臣逆党，遂乘间进言，以强国强兵为辞，大率皆套袭二十四年康逆文章，以博忠谏之名，非变政、实乱政也。”（《庚子纪事》）但煌煌上谕，确认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乱后思治，改革的决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梁启超在1901年10月所作的《维新图说》中说，维新之语，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就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心态。对于

改革的前途，当时许多人是寄予了希望的。有一篇题为《说败》的文章说：“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震旦新机，宜其绝矣，中国国命，宜其死矣；然挫之、戕之、阻之者频仍矣，而维新之火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是非所谓外形败而实胜耶？”

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民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晚清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要求“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思想的禁锢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

二

文学史家在谈到晚清小说繁荣的问题时，都